

杭州文史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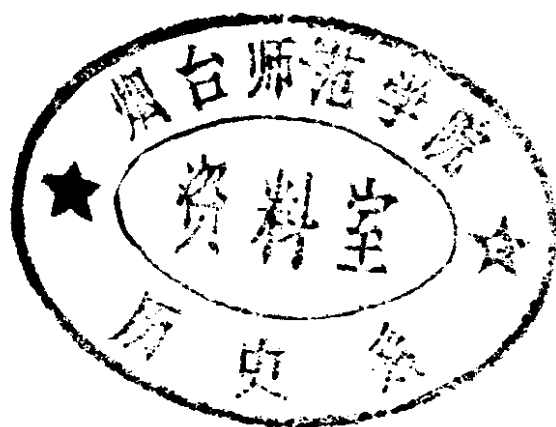
政协杭州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第六辑

杭 州 文 史 资 料

第 六 辑

(内部资料)



政 协 杭 州 市 委 员 会

文 史 资 料 研 究 委 员 会 编

一 九 八 五 年 十 二 月

目 录

一支在建德的抗日自卫武装·····	陈有根 陆国权 (1)
杭州沦陷时帝国主义者利用基督教进行侵略活动 ·····	杭州基督教三自爱国会史料组 (9)
杭州汪伪特工组织内幕·····	
·····	叶纯志口述 何国涛整理 (18)
抗战胜利后杭州的在乡军官·····	
·····	蒋成言口述 汪振国整理 (26)
蒋介石在粤二军参谋长任内的人事关系·····	宓 熙 (38)
金海观和湘湖师范·····	张天乐 (40)
我所知道的金海观校长·····	王兴隆 (50)
惠兴女中·····	褚寿康 (54)
抱经堂书店与朱遂翔·····	王松泉 (58)
抗战胜利后旅杭台湾同胞组织同乡会情况 ·····	汪坚心 (67)
仁爱医院·····	王克谦 (70)
解放前杭州市的地方卫生医疗·····	缪宇屏 (75)
解放前杭州的民间娱乐事业·····	赵 晨 (82)
杭州的制革业·····	朱尧阶 杨克昌 (93)
杭州纺织工业的产生和发展 ·····	朱耀庭 (101)
有关杭州钱庄业的几点回忆 ·····	吴彝生 (108)

一支在建德的抗日自卫武装

陈有根 陆国权

一九四二年，日寇大举进犯浙赣线。四、五月间，浙江从省城杭州至兰溪沿富春江、兰江两岸的富阳、桐庐、建德、兰溪县城，及梅城镇、洋尾埠、大洋镇、麻车埠、三河镇都被日寇占领。日寇为了水陆畅通，在建德、兰溪沿江两岸的大小村镇，都驻扎了军队。鬼子一进村，就到处抓鸡打狗，杀猪杀牛，强奸妇女，杀人放火，真是无恶不作。在一次扫荡中，日寇沿路抓了十多个老百姓，带到洋尾，用绳子捆起来抛入江里，捆一个抛一个，毫无人性的鬼子拍手喊笑，以此取乐。而国民党军队和县政府、县党部都早已溃逃，县国民兵团也解散了。

在这国土沦丧、家破人亡的危急时刻，洋尾这个早在一九三〇年七月就进行过农民暴动的地区的党组织，在陈一文（陈流）、潘力行（潘懋坤）、蔡惠荣等同志的领导下，根据上级提出的“敌人打到哪里，党的抗日游击武装力量就组织到哪里”的指示精神，于一九四二年六月在建德县洋尾乡外蔡村成立了一支以地下共产党员为骨干、以基本群众为主体的抗日游击队伍：抗日自卫队。这支部队由在群众中素有名望的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陈一文指挥。在建、兰、浦一带的人都把这支武装称为“陈一文部队”。

部队成立时，共有六十余人，由十多个共产党员为骨干，

编成三个排。经常在建东、建南的洋尾、麻车、大洋、二都、前源、马目乡一带，积极开展抗日宣传，伺机打击日寇、汉奸，维护了地方治安，深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

智 取 武 器

队伍成立之初，缺乏武器。后来得知县国民兵团解散后，有十六、七支长枪和一些手榴弹藏在大洋镇竹狗坞姓徐的保长家里。六月的一天，陈一文、蔡惠莱、潘力行、张樟富等六、七人，随身带了炒苞米、豆等干粮，绕过洋尾埠的日寇据点，扎了一个竹排，从王村偷渡到江对岸，在离大洋镇不远的山坡上，大家又详细研究了收缴这批枪枝的计划。最后决定以国民兵团的名义去取枪。于是，由陈一文冒充国民兵团的一个王中队长，潘力行、蔡惠荣冒充排长，到了竹狗坞的保长家里。陈一文在堂前太师椅上一坐，摆出一副“中队长”的架子，蔡惠荣、潘力行把保长引来见陈一文。陈一文对保长说：“现在形势很好，美国、俄国、英国和法国已经联合起来，我们要反攻了，所以要把枪枝集中起来。”保长连连点头称“是”，乖乖地把藏在他家的步枪和手榴弹交了出来。这是弄到的第一批枪枝弹药。

国民党六十三师逃散的一个排二十余人，带着武器，一直在岗山附近流窜。他们奸淫掳掠，敲诈勒索，无恶不作，老百姓恨透了他们。抗日自卫队决心解除他们的武装。于是先派汪汉清、王光田等同志接近他们，送酒送肉，投其所好，以迷惑他们。接着以烧饭为掩护，掌握他们的活动情况和生活规律。以后又派了几个同志进去，作为内应。到了六月中旬的一天，正当这些家伙喝酒喝得酩酊大醉的时候，由潘力行带领的部份自卫队员，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甩了一个手榴弹，打死了他

们的排长，其他人不敢反抗，全部缴了械。这次共缴获了二十多支枪，四、五十个手榴弹。

高楼厦人蔡昌有，是县国民自卫队队员。日寇来时，他带了几个人逃了出来，把带出来的四支枪、两箱（四十个）手榴弹，藏在岩背庙里的匾额后面。抗日自卫队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在一个夜晚派人去取了出来。

当时国民党溃散在建东的七十九师、一二九师、六十三师、独立二十三旅的一部份散兵游勇，愿以二、三十元出卖一支枪，以谋生路。为此陈一文带头凑款，把家里仅有的二担稻谷卖掉，凑了一些钱，买到十几条枪；又从隐住在蔡昆家的已脱离国民党军队的两个军官手中买来九支枪。

另外，渡船上共产党员许祥云等同志也送来五箱手榴弹。外蔡村共产党员、铁匠陈元有，召集了一些好铁匠，打了十二把大刀和十多支竹叶枪。

经过一番努力，抗日自卫队至此已拥有一挺轻机枪、五十多支步枪、三支短枪、一个掷弹筒、十二把大刀、十多支竹叶枪、近三百颗手榴弹和一部份子弹。

为了便于立足，避免引起敌人的注意，这支队伍公开取名“陆军英勇部队”。其家属和子女也积极参加后勤服务工作。

打 击 敌 伪

抗日自卫队有了武器装备后，连续打击了日寇、伪军和汉奸。

六月上旬的一个晚上，由胡汝根、林角道二人带了手榴弹去摸鬼子的岗哨，结果牵回了两头牛和一匹马。

鬼子在茅草山山岗上驻扎了一个分队，搭了一个帐篷，监视、封锁由洋尾埠通向周围多处的通道和江对面的石壁东向梅

城、西向大洋镇的通道。为了拔除这个钉子，抗日自卫队派蔡惠荣到殿子坞岳母家，与住在那里的国民党七十九师流散的一个连长何锦荣取得联系，商议共同行动。何锦荣有一个排的兵力，答应出兵配合。六月中旬的一个晚上，抗日自卫队的胡汝根、林角道等十多人从殿子坞抄山路摸上茅草山山岗，朝敌人的帐篷里投进去几个手榴弹。鬼子措手不及，不知道我们有多少兵力，未及还击，就慌忙逃跑了。这次战斗缴获了一挺轻机枪和四百发子弹。几天后，鬼子从洋尾埠沿同佳桥、外蔡、里蔡、殿子坞一带进行扫荡，结果，我们的两个联络员徐子奎和何德荣光荣牺牲，何德荣的母亲和潘复春老人被日寇反手捆绑抛入江中，活活淹死。我们虽然受到了一些损失，但是，我们用实际行动打起了抗日的旗帜，使建德人民知道，我们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才是真正的抗日部队。

当时从建德至兰溪，只有兰江一条水上交通，其他陆路只能步行，不能行车。因此，沿江各据点鬼子的补给，调遣，主要靠这条水路。抗日自卫队经常派出一个小分队，带上四、五支枪，隐藏在江边，当鬼子船艇经过时，就打一阵排枪，使得鬼子担惊受怕。从此，日寇的船艇不敢随便出动了。

从洋尾埠到外蔡村，要经过茅草山与童家山之间一条溪，溪上有一座荸荠桥，两山之间是开阔地，从童家山山顶观察洋尾埠敌人的动静是一清二楚的。抗日自卫队就在童家山的山岗上设一个监视哨，监视从洋尾埠出来的每一个人。凡是经过荸荠桥时向鬼子岗哨挥舞白毛巾（这是汉奸的暗号）过来的，自卫队就扣住仔细审问，查出是汉奸而又态度顽固的民族败类，就处以极刑。在个把月里，处决了十多个汉奸，使鬼子失去了耳目和爪牙，就不敢贸然出来扫荡了。到七月二十日（农历六月初八日），鬼子只好把从建德到兰溪沿江一线的各个据点搬

走，龟缩到兰溪城里去了。

团 结 群 众

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日，日本鬼子撤离建德，抗日自卫队移驻外蔡村蔡家祠堂，活动区域扩大到整个建东、建南地区。当时洋尾一带，地主、商人囤积居奇，有粮不卖，老百姓被迫哄抢粮食。国民党的散兵游勇和土匪恶棍，也乘机夹杂在贫苦农民中，抢粮、抢物。高垣等地还在组织“维持会”。这样的社会秩序对团结抗日极为不利。为此，抗日自卫队决定组织一次较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宣传团结抗日。参加游行的有三、四百人，群众手拿土枪、土炮、大刀，和抗日自卫队一起，从外蔡经过里蔡、高楼厦、洋程、三都镇，转了一个大圈子。当天晚上在高楼厦的一个庙里，开了一个有五、六百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会上由陈一文同志讲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要求各阶级、各阶层团结一致，共同抗日。对地主、商人提出四条要求：1.赞成抗日，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不做汉奸和卖国贼；2.不抗拒派粮纳税；3.不准私通顽军，危害人民；4.不准组织“维持会”。还宣布“只要大家做到这几点，我们会以血和生命来保证大家的安全。并做到：1.爱民如子，遵守纪律；2.不收缴自己的武器（暗示地主只要抗日，就不缴他们的枪）；3.公平买卖；4.借东西有借有还，损坏了按价赔赏；5.不多征赋税。”在群众大会上还公审了三个土匪，并当众枪毙了为首的胡老四。同时，把被土匪抢去的财物拿出来让群众认领。这次大会，地主、商人受到很大的震动和教育。如塔后、里蔡等村的地主、商人原来都想组织“维持会”，会后就不成立了。囤积粮食的地主，也拿出部份粮食来卖给农民。从杭州迁校到高垣的宗文中学师生向《浙西日报》投稿，称赞抗日自卫队作

战英勇，纪律严明。抗日自卫队在斗争中日益壮大，局势也逐步稳定。

加 强 领 导

抗日自卫队在稳定秩序的同时，还制定了六条加强自身建设的措施：1.加强集中统一。此时党的领导核心是陈一文、蔡惠荣、潘力行、汪汉清、朱增球，一切重大问题由党组织的领导核心集体研究决定；2.整顿部队的组织机构。抗日自卫队的番号原为“陆军坚勇部队”，为了隐蔽和统战工作的需要，改称“乡自卫团”。为了便于指挥作战，把比较懂军事的同志放在掌握部队的岗位上，陈一文为团长、总指挥。成立三个突击排，第一排由潘力行任排长，第二排由朱增球任排长，第三排由汪汉清任排长。每排三个班；3.加强党的工作。当时地方上有村支部，部队也成立党支部，部队党和地方党是统一领导的，党的工作由蔡惠荣和朱增球负责；4.开展军事训练，提高部队的军事素质，增强组织性、纪律性，增强体质；5.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征粮征税，以保证部队的供给。税收工作以吴小坤（张东昌）为主，住在前源乡的里陈村，征收往返浦江商人的税，这是部队的主要经济来源。征粮工作以蔡昆、张樟富为主；6.加强统战和情报工作。从县城的东关到各乡、各村都设情报联络员，由徐文、王银海等五人负责。徐文兼任西乡的联系工作。统战工作由童岁新、蔡昆负责。经过这次整顿，进一步加强了党政军统一领导，各方面的工作更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部队内部团结加强了，上下关系融洽了，军民关系也更加密切了；部队的组织指挥系统比较健全了，组织性，纪律性大大加强，一切行动听指挥，严格遵守政策纪律；军事素质和体质也有了增强。部队的战斗实力有了很大提高，使国民党的

地方武装和土顽也对之害怕三分。

独 立 自 主

国民党反动派对这支部队的成长壮大十分恐惧。伪县长许亚夫和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方镇华，千方百计想搞掉这支队伍。他们派了亲信王自仁和特务陈昌荣来谈判，说愿意派五十个人带五十支枪来“支援”自卫队。陈一文、蔡惠荣、潘力行立即商讨对策。他们考虑如果同意，部队就有被分化瓦解的可能；如果不同意，将会加深双方的矛盾和仇恨，这对团结抗日和部队的生存、发展不利。于是想出一个既不完全拒绝、又不完全同意的办法，答复对方：“我们这里人已很多，但枪少，地方也不大，回旋余地小，土顽组织多，情况很复杂，还不大稳定，因此，要支援的话，先把枪送来，人在需要的时候再来。”就这样巧妙地拒绝了他们的“支援”，使其阴谋未能得逞。当时地方上的土顽很多，他们之间常为争权夺利而发生冲突。有的还企图拉拢抗日自卫队卷入他们的斗争。对于这种狗咬狗的冲突，抗日自卫队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持不介入态度。一次，“忠义救国军”苏天候率部来到洋尾乡，这是一支装备较好的部队。苏亲自与自卫队谈判，要自卫队与他的部队合并，并邀陈一文去当大队长。陈一文同志对此十分警惕，事先把部队疏散到山上，使苏部看不到自卫队的实力，不敢轻举妄动，巧妙地拒绝了他们的提议，没有上当。

一九四三年三月，金华特委决定调建德的这支抗日自卫队到义乌与八大队汇合，以加强革命根据地的武装实力。四月初，陈一文、潘力行、蔡惠荣等同志带领抗日自卫队离开建德到义乌，与八大队汇合，编为八大队的一个突击中队，中队长陈一文，指导员程远，分队长潘力行、蔡惠荣、汪汉清，司务

长吴小坤。以后又编入金肖支队第二大队。这支人民武装又在解放战争中作出了新的贡献。

（建德县政协供稿）

杭州沦陷时帝国主义者

利用基督教进行侵略活动

杭州基督教三自爱国会史料组

杭州基督教会，从开始的时候起，就为英、美、法、德等帝国主义所操纵。杭州沦陷后，日本军国主义者 为配合军事侵略的需要，千方百计的渗入基督教会，与英美派势力展开交锋，争夺领导权；汪伪组织也不甘寂寞，企图染指。当时基督教华籍教牧人士，大都尚能保持民族气节，或超然态度，但也有少数败类，甘心充当日伪帮凶。本文所述，就是当年日英美等帝国主义分子及汪伪组织，竞相利用基督教进行侵略活动的点滴纪实。

一、英美势力被逐出杭州基督教会

中日战事爆发后，英美与日本帝国主义相互默契，杭州基督教的英美籍教牧，还能控制教会活动。“八·一三”上海战事失利，日军分兵南下，直逼杭城，英美除了将所办的之江大学、蕙兰中学、弘道女中迁往上海外，所有外籍传教士和侨民根据英美差会的指示，仍然留杭。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杭市居民大都逃迁，外籍传教士各圣公会的高德斯、苏达立、铁逊坚（以上都是英国人），长老会的华葆仁、万克礼、明思德，浸礼会的葛烈腾，青年会的狄尔耐（以上都是美国人），天主教

的梅占魁（法国人）等，分别打电报给上海英，美，法领事馆，报告杭州国民党军队撤退情况，并藉此要求日军到杭后保护侨民及教产。一方面积极开展战时服务工作，日军占领后，帮助安定社会秩序。

为了开展战时服务工作，英籍传教士苏达立邀集了杭州各宗教团体负责人在家开会，决定筹组“国际救济会”及“红十字会委员会”。参加会议的有耶稣教会的苏达立、高德斯、明恩德、万克礼、葛烈腾，天主教的梅占魁，邮电局局长柯登，亚细亚煤油公司经理华来士，青年会代理总干事朱孔扬，玛瑙寺当家本性，道教玉皇山负责人李理山，杭州市商会谢虎丞、王五权等二十六人，推定明恩德为会长，苏达立为书记，万克礼为司库。会上并决定几项具体措施：一，在青年会、各教堂、玛瑙寺等处设立难民收容所；二，利用圣公会办的广济医院和邻近的树范中学校舍，收容国民党伤病员兵；三，以国际救济会的名义，通过各教会团体调查登记，对生活困难户发放一部分美国面粉及棉衣；四，利用各教堂余屋，举办供应一顿午餐（麦糊）的苦儿班，救济难童。所需费用由红十字会及地方团体和商店等捐助。

十二月廿三日至廿五日，日军进占杭州前后，各收容所共计收容难民一万七千多人，其中一部份为教徒，大部份为妇女儿童。日军占领杭城的最初几天，在南星桥至闸口一带烧杀惨烈，市区倒还安谧。收容所历时三个星期左右，人心稍定，即告结束。无家可归和有家难归的，分别集中到青年会、玛瑙寺、天主堂和蕙兰中学四处，继续收容了一个时期。

广济医院收容被国民党遗弃的伤病兵员，达六百六十余人，国民党市政府在撤退前，曾拨出五万元作为收容伤兵的医药和伙食费用，国际救济会也拨了一些救济粮食和药品。这批

伤病员兵，到第二年七月间，有一百多名轻伤士兵，被日寇带走，关到陆军监狱，有些被杀了，未杀的被迫充当了伪军。

就在这个时期，英美帝国主义分子苏达立唆使和协助谢虎丞、王五权筹组了维持会，并让出广济医院为维持会会址（以后才迁回旧商会原址）。苏达立与圣公会高德斯，经常与日本领事馆及日特机关联系。长老会的万克礼，不时宴请日寇军宪头目表示亲近。一九三九年夏，他还以西籍教士的身份，乘坐日军卡车，去莫干山等地，以视察教产为名搜集沿途中国军队情报提供日军。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军偷袭珍珠港以后，驻杭日军立即出动宪兵，搜查了英美传教士的住宅，监视他们行动。英美所属的教产，如思澄堂、湖山堂、在名堂、信一堂等，都被钉上敌产的牌子，连同所有器皿家俱物件，也都一律登记封存。广济医院在一九四二年八月卅一日由日军接管，改为日军伤兵医院。院内英籍教士护士，均被迫迁居松木场麻疯病院。同年十一月，又将英美籍教士全部集中上海，其中费佩德、高德斯划为“尉级非劳动战犯”，苏达立等被带进上海海防路集中营，挂上“危险分子”的头衔，一九四五年六月，将他遣送至华北。从此，自一九四二年起为英美帝国主义分子控制的杭州基督教会，由日本特务分子取而代之。

二、日特攫夺教会领导权

早在一九三八年春，日本占领军当局，就打了杭州基督教会的主意。他们派了东京的土界直武牧师充当打入杭州基督教会的第一名先锋。土界直武西装革履，能说流利的英语，经常到思澄堂做礼拜，接近个别华籍牧师，摸索底子。他持着印有“日本特务机关嘱托牧师”的名片，访问华籍牧师范光荣，表示愿

意与中国教会“亲善”，说教会有困难，可以帮助。在交给范的一篇英文《爱兄弟》讲道稿中说：“信仰耶稣的人们都是兄弟姐妹，应该打破国籍民族的界限，彼此相亲相爱。”同年秋天，日军宪兵队又派遣浪人小山寅之助伪装牧师，来杭州活动。他经常去思澄堂做礼拜。每次故意早到迟退，进出都向讲台行九十度鞠躬礼，意在争取中国信徒们对他的好感。后来他带了一名翻译，向思澄堂提出两项要求：一，要求在堂内设立日本教会，使在杭州的日本信徒有礼拜的机会；二，要求借用礼拜堂，开办日语学校，交流中日文化，促进两国亲善。范光荣牧师向他说明思澄堂是美国教产，不便出借，婉予拒绝。一九三九年秋，小山寅之助笼络教会中的败类阮其煜、周元璋、宋保禄等人，占用了井亭桥堍一个不属英美教产的耶稣教堂，作为活动据点，开办了一所日语学校，招收中国青年，培养为他们服务的翻译人员，并发展教徒。

小山寅之助又与阮其煜、周元璋、宋保禄等人共同发起组织“东亚基督教会”，小山自任牧师，陈烈初、周元璋及日语学校日籍教员立木陆夫等为长老，于一九四〇年三月举行成立大会。会上由小山按立阮其煜为牧师，做他的助理。此后还举行过周年和两周年纪念大会，强邀其他教会的牧师和信徒参加，以此来与英美教会分庭抗礼。为了扩大声势，竟规定凡参加“东亚基督教会”的人，付出少数钱，就可由小山代向日本宪兵队领取通行证，往来各地码头，通行无阻。一时不少人被骗入教。当“东亚基督教会”立定脚跟后，小山就要求参加“杭州基督教协会”（这是杭州基督教的联合组织），企图进一步攫取杭州基督教的领导权。但经该协会负责人宣绥降、范光荣等以“协会为英美教士的组织，日本教士未便接纳”为词，予以婉拒，仅允许他们的中国牧师阮其煜，以个人名义参加

“教会同工合一祈祷会”。

其后小山又指使阮其煜出面主编《东亚基督教会月刊》，宣传中日基督教“亲善”；组织“兴亚青年协会”，吸收商家子弟参加，举办篮球、乒乓、日语比赛，开办图书馆、展览会，与美国控制的青年会抗衡。

小山寅之助终究掩盖不住他的“浪人”本色，他勾结大福商行经理周永林、钟士林等人贩运大米、食油、火油、棉花，投机倒把。平日狂酒纵饮，奸淫妇女，无恶不作。日语学校一个姓王的女教员，被他奸污以后，一直被迫姘居到抗战胜利。

太平洋战事爆发后，日本军国主义者正式派出基督教领袖阿部义宗来华活动。一九四二年春，阿部会同上海中华圣公会主教俞恩嗣等发起成立“华中基督教同盟”，在上海虬江路礼拜堂举行成立大会，胁迫各地基督教会派员参加。杭州基督教协会由宣绥降、范光荣二人出席。会上，阿部说“华中基督教同盟”的宗旨是“共同携手，团结一致，消除成见，彼此相亲”。他特别强调“服从领导”，威胁各地教会必须服从“华中基督教同盟”的指挥和监督管理。会上选出阿部为该同盟会长，俞恩嗣、杨绍诚（南京中国牧师）两人为副会长，金炎青为书记。从此，杭州基督教会成为该同盟的成员之一，而受其约束了。

不久，阿部以“华中基督教同盟”的名义，派遣日籍牧师本多釜次郎来杭主持教务。冒牌牧师小山寅之助专做日语学校和“兴亚青年协会”的工作。

本多的任务，表面上是为日籍信徒设立日本教会，实际上他是企图全盘掌握杭州基督教会的活动。他除了每个星期天在马所卷三十九号圣公会住宅为少数几个日籍信徒做一次礼拜外，其余时间，他以日本牧师的身份，干预和参加中国教会的各种

活动。

(一)组织“中日基督教协议会”。本多根据阿部的指示，在一九四三年春，诱逼杭州的中国教会与日本教会联合组织“杭州中日基督教协议会”。上海“华中基督教同盟”派日籍牧师中泽和日本东京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小谷清来杭参加在思澄堂召开的成立大会。会上选出原杭州基督教协会负责人宣绥降为协议会会长，本多和“东亚基督教会”牧师阮其煜担任掌握实权的副会长，从而取得了杭州基督教会的领导权，控制杭州基督教会。如同年十一月，本多发起在思澄堂召集中日信徒联合举行秋收感恩礼拜，动员信徒们捐献米、麦和土产，由本多亲自送至孤儿院、麻疯病院，用了别人的东西来打扮自己的慈善面孔。在“中日基督教协议会”的领导下，本多一再指派杭州基督教主要人士出席“华中基督教同盟”所主持的各种会议。如在一九四三年，本多偕同宣绥降去苏州参加按杭州形式组成的“苏州中日基督教协议会”，表示相互支持与友谊。又去上海出席由阿部义宗亲自主持的“华中基督教同盟”会议，听取阿部义宗的“大东亚新秩序”，“大东亚共荣圈”的政治说教。后来，阿部亲自来杭，召开座谈会，赞扬杭州基督教会在促进中日传统友谊上取得的“成就”。他还要求中国教士“好好听本多的话”。

(二)派遣宣抚团来中国。一九四四年秋季，“日本基督教同盟”派遣一个“基督教宣抚团”来中国，由阿部陪同到杭州。这个“宣抚团”由日本的所谓“大布道家”贺川丰彦、国会议员小崎和日籍牧师中泽等人组成。专在当时中国的日占区作旅行讲演，宣扬“大东亚共存共荣”。“宣抚团”来到杭州，即在日本宪兵的保护下，在思澄堂召开布道大会。贺川丰彦在一天当中，连续作了两次讲道，引用圣经上一些词句，说